



为红色娘子军读报

王路生

父亲离开我已有二十七年，他生前向我讲述的他与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的一段特殊缘分，为老战士读《人民日报》的片断人生，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后半生。

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读过高小的父亲参加县里的工作队，参加清匪运动。有一天，他在乐会县府大院，第一次阅读到铅印的《人民日报》，欣喜若狂。恰巧这一天，红色娘子军第一连指导员王时香来县府办事，与父亲相逢时看到《人民日报》，便拿过来阅读。王时香童年时读过书，粗通文字。第二年，县里开展老苏区、老红军调查登记工作，父亲参与其中，深入红色娘子军诞生地阳江镇调查走访，从此与红色娘子军一连连长冯增敏、二连连长黄墩英和指导员庞学莲、战士王运梅、卢业香等人结下不解之缘。当年，人们了解中央、省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一是收听广播，二是阅读报纸。父亲下乡时，挎包里除笔记本外，还有一份《人民日报》。娘子军战士大都是文盲，父亲便义务为她们读报，让她们充分了解国内外大事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人民日报》成为父亲与红色娘子军见面时的重要精神食粮。

在读报的日子里，尤其让娘子军高兴与自豪的是两件大喜事——1961年7月，

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1970年，芭蕾舞剧电影版《红色娘子军》在全国上映。关于这两条文艺新闻，《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并刊发著名导演谢晋、著名演员王心刚等主创人员的创作访谈和观众的观影评论。父亲先后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召集大家聚在一起，为她们读报，共同分享这两部红色经典的艺术魅力。

父亲到宜兴出差时买回一把紫砂壶，正面刻绘的图案正是娘子军党代表常青指路图。农闲时节，王时香、王运梅、卢业香等一众战士便相约到父亲居住的老屋，围坐在一方长方形黄蜡石桌旁，煮茗，叙谈，聆听父亲琅琅的读报声。这样的读报场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反反复复上百次。有时候，父亲读得喉咙干了，王时香便接着读。她们一边汲着紫砂壶冲泡出来的茶水，一边“听”报，《人民日报》的墨香陪伴她们度过惬意时光。

父亲工作很忙，他为娘子军战士读报，一是利用下乡时间见缝插针；二是节假日下去或王时香们登门时读报。尽管不是天天读报，但父亲与她们的那份友情，让《人民日报》成为这份特殊缘分中最重要的见证物。

父亲临终前一天，王运梅、卢业香登门探望。父亲叫我扶他坐起来，坚持要为老

战士读报，但此时他说话十分困难。我索性拿过报纸，父亲握着我的手，缓缓地低声说：“有机会的话，替我为她们读报……”

1991年春，我从临时的“替补”正式成为读报的主角。

尽管不是每一天上门读报，但每一次与老战士通话时我都会将《人民日报》上的重大新闻告诉她们，让她们熟知国内外的大事。七十年来，《人民日报》见证共和国的历史变迁，琼海也因是娘子军的故乡而备受《人民日报》瞩目，曾有二十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上亮相。而红色娘子军老战士们也从《人民日报》了解到与她们密切相连的多个重大历史节点。

2000年5月1日，红色娘子军纪念馆开园，王运梅、卢业香、陈振梅、王先梅等娘子军老战士先后入园暂住，我也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她们。每一次走进她们的大门，我都向她们敬礼，并大声喊道：报到！王运梅们便颤巍巍地站起来，同样向我回敬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我为她们读报前的常规动作，也是我与她们的一份心灵契约。

历史也有巧合。2001年1月15日，我在纪念园里和王运梅、陈振梅老人拉家常，主要为她们读报的当儿，来海南调研的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白克明进到纪念园。当王

运梅知道是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来探望慰问她时，显得非常高兴，她说：“《人民日报》是我们晚年生活中的精神食粮。想不到今天还见到人民日报社的贵宾、稀客！我们与《人民日报》真的有缘啊！”白克明同志可能没有想到，在海南，他还见到一群由娘子军老战士组成的《人民日报》的特殊读者！此后几年间，人民日报社的张研农、谢国明等领导来琼海调研时都看望了娘子军老战士。

《人民日报》不仅是老战士的知音，也是一座友谊的桥梁。2006年冬，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老战士王运梅从《人民日报》上得知此消息后对我说，代她和她的姐妹们写封信，祝贺铁凝妹妹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我应允写了信。2007年元旦，王运梅收到铁凝同志的贺年卡和新春祝福语，同时还收到铁凝同志的散文集。此后直到王运梅离世，王运梅和铁凝之间，每年新春都互通书信，互致问候。

每当我坐在老战士身边读报，心灵就又一次接受精神洗礼。她们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坚定信仰、英勇作战、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她们在和平年代，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的人生观有了重要的支撑与观照。为她们读报，其实也是我一次次地阅读她们的精彩人生。她们通过“听”《人民日报》，了解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前进的足音，了解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了解祖国各地的新风貌、新气象、新作为。

2014年4月，在送别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老战士卢业香时，我手持一份令百岁老人终生牵挂的《人民日报》。我想让这份报纸在这样的时刻凝固成为不朽的诗魂，告慰英灵。一代琼花的巾帼传奇永远不会谢幕，她们与《人民日报》长达六十余年的特殊缘分，连同她们的家国梦，连同父亲和我为娘子军读报的幸福时光，永远铭刻于岁月的深处。

（作者为海南省琼海市新闻中心员工）

等作品，发表次数达六十余次，样报我也都收藏至今，虽然不一定是整张的，但是我都会在上面写上日期，以示我对这份劳动成果的尊重。记得《拿鱼》发表后，得到人民日报社寄来的四十元稿费，这在当时来说相当有分量。

与其他媒体相较，我与《人民日报》的往来最持久也最深入——虽然我也经常向其他媒体投稿，但与编辑没有往来，作品或者被刊登，或者石沉大海，但我与《人民日报》美术编辑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知道这都是基于《人民日报》和编辑对作者成长的关心和负责。一个画家或者一个作家，都是通过作品累积起来的，而报纸是检验作品好坏的一道重要门槛，尤其是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更不会随意挥霍它的版面。带着这份尊重，《人民日报》总是我投稿的首要选择，每次有新的创作而且自己觉得不错的，我就会第一时间投向《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远比我其他媒体刊上发表的要多。因为这对我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坚持这个观念，即《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有着排头兵作用，作品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证明它得到了肯定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反之则说明我还需要再进步、再磨砺。就此而言，《人民日报》是我创作的重要试金石。

几十年来，我也是《人民日报》忠实的读者。每一次读人民日报尤其是文艺版，我都能深切感受到《人民日报》的高度和深度，给予我精神陶养。时至今日，年已九旬的我依然手追《人民日报》，这既是对我一路成长的追忆，也寄托着我对《人民日报》美好未来的一种希冀。

（作者为水利部离休干部、版画家）

刊登在头版重要位置的《痴心赤胆》等多篇通讯和理论版头条的《大力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等论文；刊登副刊版头条的《难忘铁道兵精神》被多家报刊转载、几十家网站转发。

范文剪报本是我重要的学习资料，作品剪报本是我辛勤的劳动成果，我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样珍藏着、呵护着。

铁道兵走南闯北，这几个剪报本一直陪伴在我身旁，落过北疆的雪花，沾过南国的露珠，听过东海之滨的涛声，饮过黄土高原的风沙。跟随我时间越久，我对它感情越深。入伍三年两头搬家，我宁可扔掉箱箱柜柜等其他用品，这些剪报本从不舍得丢弃。凝望着办公桌上那摞保存完整、倍受珍惜的剪报本，我心潮难平：是《人民日报》范文启发和引导我走上写稿之路。《人民日报》是我永远的精神食粮。在《人民日报》创刊七十周年之时，我要说一声：“《人民日报》，谢谢你！”

（作者为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指导小组原副组长、中宣部宣教局原副巡视员）



我是恢复高考后走出乡村，走进平谷小城的。

走进小城，才知小城真的很小，东西、南北也就一里多地，没走几步，就到小城尽头了，好一座玲珑袖珍的小城！四遭城墙早拆去了，可墙基还在，就此开辟了环城路。城内主要是青砖青瓦的民居，也很陈旧，甚至残破。有一栋半栋的楼，恍如鹤立鸡群，是在过去老县衙处盖的县招待所。角角落落散落着雕花柱础、螭首残碑之物，透露着小城古老的信息。当然，城里老人聊起过去，会津津有味地比划着讲述道：这里是老县衙，南面是文庙，北面是城隍庙，旧时规矩，知县要先拜城隍再上任。当然也记得哪条是邻里相让的仁义胡同、哪条是曾白塔耸峙的塔儿胡同等等。老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城东紧邻洵河，就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洵水，也是战国成书的《竹书纪年》记载的齐师与燕师战于洵水的洵水。洵河上横陈一座破旧的老木桥，不足一丈宽，两边护栏有些零落，桥面时有鸡窝坑一样的漏洞。透过漏洞，可见桥下的水自北向南流去。

小城慢慢地越过旧墙基，不声不响地向西拓展。那些大小机构，一个个从小城搬出，造型各异、或高或矮的建筑矗立起来，以至悄然形成一条与小城相连通的宽阔大街。由于县政府就在大街的主要地方，人们便习惯地称之为“府前街”了。府前街是小城贯通东西的主要街道，一设计就宽四五十米。小城人那时很闭塞，走惯了乡下的土路，哪见得这么宽的街道？朴素的情感之下，认为这得占多少地！土地在小城人心中，向来是无比重要的。那时小城确实人很少，除时有摇晃着叮咚铃声、戴着粪兜的马车招摇过市外，按着长短笛的汽车寥寥无几，街道显得空荡荡的。谁知没几年，小城人渐渐多起来了，汽车也渐渐多起来了，四面八方的外乡人也来到这儿，街道车水马龙，人们这才叹服当初决策与设计的前超前意识，甚至以今之境况，惊呼当初为啥不更宽些，因为小城已开始像京城一样地堵塞了。居民也随之从逼仄的旧城搬出，重新聚落成一片一片新的小区，连几十层的高楼也树林般一幢幢拔地而起，俨然一座充满现代气派的城市呢！

我刚来小城，窄窄的街巷道路，根本没有、也不用红绿灯。偶尔去趟京城，见着红绿灯都不知咋走。也记不得从啥时起，小城在要冲路口处开始安装红绿灯了，现在抬眼就是红绿灯，恐怕没人说清到底安装了多少。红绿灯就像一双双眨动的眼睛，帮助小城人看路，当然也规范着小城人来往出行，小城人也自觉地该停停、该行行，心底明白这言行举止就叫文明。跟红绿灯一样，小城也不知从啥时起又出现艺术的雕塑，出现点景的山石，如今几乎到处都是，石头上还镌刻着书法字迹。不是咱炫耀，毕竟平谷是中国奇石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怎能不近水楼台，就地摆着些奇石，刻着些书法呢！? 而雕塑最具代表性的，就属小城东部的“奔马”了。小城人生性务实，当初对这新事物有些不理解，说弄这个有啥用，顶不了钱花，也当不了饭吃！久而久之，小城人潜意识里也接受了，一说到哪儿“大马”那儿！“奔马”竟成了小城最早的地标。小城陆续又建造了群龙石雕“腾飞”，寓意不言而喻。还有迎宾环岛“大桃”，以象征平谷为中国大桃之乡。这些大大小小的雕塑、刻石，都已成为小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世界展示着小城独有的个性与魅力，展示着小城人跟随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眼光、襟怀与精神。

我来小城这么多年，主要研究平谷历史文化，走遍平谷诸多的山山水水，访谈平原与山乡的村村落落，才知平谷三面环山，中为谷地，因以平谷名。这里有十万年前人类活动的历史，七千年前的上宅文化，五千年的轩辕文化，三千年的青铜文化，两千二百年的建置文化，千年道教文化，六百年的长城文化以及英勇悲壮的抗战红色文化等等，这悠久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与中华文明一脉绵延，正是小城发展自信的基因与底蕴。

站在山巅眺望，平谷东、南、北三面环山，形如盆地，独西南敞向京城。就在西南豁缺处，二十里长山横亘成了一道照壁，使平谷愈加藏风聚气。山川沃野花木繁茂，洵水、洵河映带左右，小城怡然其间，似呈二龙戏珠之势。洵河那座历经沧桑的老木桥，仅石头砌筑的桥墩尚在，留下一抹历史的遗迹。桥墩南北，各一座可驾车并驾的高架桥，畅通着小城。近年河道治理，河长上任，洵水、洵河不再干涸，不再污浊，绿水清流，白云倒映，水鸟翻飞，小城一派冷水韵。如今小城向西已延伸五六里，不知不觉越过了洵河，甚至周边还建了卫星城镇，过去地道的农民也随之步入城镇化的浩浩进程中。

四十年，于宇宙不过一瞬，于我却由青春洋溢而渐入老境，每天我走进走出的小城呢？从历史遗留的旧墙基上走出，愈发地生机勃勃，实在是今非昔比！以后还会如何？我真的不敢设想，不能设想，根本也没法设想，只管随着小城的脚步，随着匆匆的时光，一起向明天走去！

明天——我的山水相依的小城，我的生态宜居的小城，我的历史悠久的小城，我的工作于斯，生活于斯，无限眷恋的小城！

小城变迁

梁福善

成长的力量

莫 渊

从195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刘玉花和房友好》算来，我与《人民日报》结缘已六十五年。作为一名由业余爱好者成长起来的版画创作者，如果说六十余年中我艺术上有什么成长，这与人民日报社的关心、支持和鼓舞是分不开的。

我1928年出生于江苏盱眙，没有经过专业的美术学校教育，画画纯粹是自己自小萌生的业余爱好。这个爱好一直伴随我的成长。参加工作后，我从常熟县委宣传部调到北京水利部，从江苏到这个专长，或负责美术编辑，或负责治淮陈列馆和水利部展览设计。受新中国成立前轰轰烈烈的抗战木刻版画影响，在常熟时我便开始学着木刻创作。1953年调到北京后，我不断拜访著名版画家李桦、黄永玉、王琦等前辈，并向他们请教，再加上实际工作需要，广泛接触祖国水利建设、基层生活和大好河山，阅历不断丰富、视野逐步开阔，更加激发创作热情，我便以画笔和刻刀来表达我内心的微笑和对生活的感受与热爱。正是基于对生活的切实感受以及我对版画发展规

律的不断探索，我的版画从取景到构图都是根据不同题材、不同景象或者意境追求去创作的，很少有雷同。其实，艺术创作就像作家写文章，既不能抄袭别人，也不能抄袭自己，每一次创作都要闪现出智慧的灵光、闪耀出生活的温度，这既是艺术创作的首要准则，也是需要艺术家不断进行的自我突破。

除了来自生活的激励，推动我成长的力量就是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对我更是意义非凡。第一次给《人民日报》投稿是在1953年，那时我才二十五岁。当时发表的并不是版画作品，而是在深入基层中看到一对年轻人反对旧观念、自由恋爱的故事，就这种反抗精神我写了一篇通讯《刘玉花和房友好》并投寄给《人民日报》，得到发表并被苏南等诸多地方报纸转载，这对我鼓舞很大。

时隔三年，1956年《人民日报》第二次刊登我的作品，但这次是我的版画作品《拿鱼》。《拿鱼》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产生广泛影响——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美术展览上获得银奖，同时被苏联列宾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国

家美术机构收藏，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采用这张作品，其他媒体也进行转载，就此我“一举成名”。这特别坚定了我对木刻的学习和研究信心。一方面，在革命版画尚为主流的当时，我的风景式、抒情式的版画创作并未得到版画前辈们的充分肯定，但这一作品发表并得到充分肯定坚定了我追求生活感受进行版画创作的决心。另一方面，在1962年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我所在的《水利与电力》杂志停刊，于是我就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加入黄永玉工作室学习木刻。“自学成才”的我，在黄永玉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组。当时，版画组的人都会定期相聚，进行创作交流，这都给了我学习和深入研究版画的机会。从此北京有关的美术活动特别是版画活动我都会参加，而且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坚持认真地学和探讨，就此走上专业创作之路并得到专业领域认可，后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版画院聘请我去当顾问。

《拿鱼》发表后，我坚持给《人民日报》投稿，至今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水上猎人》《大别山中》《黄土高原新貌》

四个剪报本

王开忠

我存有四个剪报本。这四个剪报本都与《人民日报》有关。现在，它们整齐地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凝望着这摞剪报本，我思绪飞扬，又回想起那难忘的求学、写作生涯。

其中三个剪报本，是剪贴《人民日报》范文的本子，都很厚，有两个已经变黄，历经岁月烟雨。

事情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那是1969年初，我入伍来到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分配在连队当文书。当时连部订了一份《人民日报》，是我们唯一的学习资料。每天学习，我都给战士读报上的重要文章。到了下月，要把报纸夹上的报纸拿下，我把报上有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剪下来，整齐地贴好，以便系统地学习。以后，我调到团机关、师机关、兵部机关以及铁道部、中宣部机关工作，这个习惯一直坚持，而且剪

报的体裁不断丰富，不管是理论、评论文章，还是新闻报道、文艺作品，只要精彩、新颖，我都把它们剪下来粘贴在剪报本上。剪贴的消息，或事例典型、主题重大，或聚集热点、关注民生；剪贴的通讯，或站位高远、大气磅礴，或编珠缀玉、细腻感人；剪贴的评论，或高屋建瓴、思想深刻，或文笔犀利、切中时弊……每天，我都要如痴如醉地翻阅、学习，有些特别好的作品，我常常看上十几遍，乃至几十遍，最后几乎都能背下来。这几个剪报本，成了我的学习乐园。

第四个剪报本是剪贴自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作品的本子。也很厚，半新半旧，上面较新，下面较旧，纸越向下越黄，淡黄，继而浅黄、深黄。

这个剪报本是上面所讲的范文剪报本派生出来的。由于我经常翻看范文剪报本，学习《人民日报》上的好文章，不仅提高

了政策水平、增长了文化知识，还摸到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渐渐地产生给《人民日报》写稿的想法，想写出像《人民日报》上那样的好文章。大概是1970年底，我就开始向《人民日报》投稿。从此，我既是《人民日报》的忠实读者，又是《人民日报》的忠实作者。

《人民日报》编辑素质很高，不仅业务强，而且热情助人，真诚对待作者。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但他们经常热情地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为我这个普通作者默默无闻地作嫁衣裳，这更激发我为《人民日报》写稿的热情。

岁月如流，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居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百八十多篇各种体裁的作品。其中，有刊登在头版重要位置的《原铁道兵“兵改工”作出贡献》《铁道兵转业5年建成6条铁路》等多篇消息、有

